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影响的焦虑

## 一种诗歌理论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Second Edition)*

[美] 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 著  
徐文博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影响的焦虑

## 一种诗歌理论

[美] 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 著  
徐文博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 / (美) 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著；徐文博译. — 新 1 版.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3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书名原文：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ISBN 978-7-300-26822-4

I. ①影… II. ①哈… ②徐… III. ①文学心理学 IV. ①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5965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影响的焦虑

一种诗歌理论

[美] 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著

徐文博 译

Yingxiang de Jiaolü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1 插页 2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9 000

定 价 3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移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人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

(代译序)

徐文博

本书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曾与耶鲁大学另外三位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在1979年合作出版了《解构与批评》一书，人称“耶鲁四人”。

布鲁姆生于1930年，年逾古稀仍执教耶鲁，且笔耕不辍。布鲁姆著作等身，但他在西方（乃至中国）文学界产生影响最大者当推其早期代表作《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1973年），以及在本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诗的误读”的四部曲，即《影响的焦虑》、《误读之图》（*A Map of Misprision*, 1975年）、《神秘哲学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 1975年）、《诗歌与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 1976年）。至于布鲁姆的后期著作，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是他依据个人观点对欧美文学传统所做的一个历史小结：《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1994年）。

1973年《影响的焦虑》付梓时，布鲁姆43岁，正值书生意气风发、不惧推陈立新之人生阶段。他在书中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理论，结合尼采的超人意志论和保罗·德·曼的文本误读说，通过对传



统影响的焦虑感的阐发，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诗的误读”理论，名之为“逆反批评”（Antithetic Criticism），即批评界所谓的布氏“诗的影响论”，亦称“误读理论”或“焦虑法则”。此书一出，影响甚大，引起欧美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布鲁姆用“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在随后的论著里，特别在“诗的误读”四部曲的后续三部里，布鲁姆对自己的诗论不断丰富和修正，最终形成“二十年来最大胆最有创见的一套文学理论”。

布鲁姆对“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反映了诗人对传统影响扼杀新人独创空间的焦虑情结，显示出敢于同传统决裂的气概。布鲁姆的理论聚焦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共时性的具体的诗作，而对所论及的不同诗人的作品的历时性侧面则有意识地轻描淡写。布鲁姆诗论中所谓的“修正”及“逆反”，从本质上分析，实际上就是“迟来者诗人”有意回避——从而削弱或消解——“前驱诗人”（即传统）对其诗作之影响的各种广义的修辞技巧。布鲁姆运用了现代心理分析学的“误释”（misprision）和“逆反”（antithetic）等概念，把一首首具体的诗歌作品从历史和传统背景的框架中分离出来，让它们自在乎于历时性的瓜葛和共时性的羁绊之外，以一篇篇天马行空式的独立文本的身份，来经受本书开列的六种“修正比”的检验和审视。

布鲁姆的“诗的误读”理论的客体仅限于启蒙运动之后的英美主要诗人，即本书所谓的“强者诗人”（strong poet）。他把1740年以降直至当代的英美诗歌传统均划入他的诗学上的“浪漫主义”阶段。在这一基本时间架构里，他着力研究各个强者诗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布鲁姆认为，在这一广义的浪漫主义阶段，弥尔顿和惠特曼（加上爱默生）分别是英美两国诗歌传统的影响源头。对于以弥尔顿和惠特曼为代表的诗歌传统，“迟来者诗人”处于一种甚为尴尬的境地——总是处于传统影响的阴影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阴影，使自己的诗作“显得”并未受到前人的影响，从而足以跻身强者诗人之列呢？由此形成了“影响的焦虑”，即对传统影响的心理焦虑，或由于传统影响而产生的焦虑感。布鲁姆从互文性视角阐述了这种焦虑的起因，并以“误释”和“逆反”为理论基

础，提出了超越“影响的焦虑”的不二法门——解构式修正。

根据布鲁姆的理论，“诗的传统—诗的影响—新诗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的前驱者的结果。时至今日，诗歌的各种主题和技巧都已经被千百年来的大诗人们使用殆尽。因此，当代诗人难以使用正常的手段去光明正大地超越前辈巨擘的成就。然而，既然我们对前人诗歌的理解基本上是人云亦云，是前人千百次“误读”的结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各种方式去“误读”和“修正”我们的前人，亦即贬低我们的前人，从而树立我们自己的风格与之抗衡呢？

对于诗的传统和传统诗人，布鲁姆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渴望跻身强者诗人之列的当代诗人——新人（ephebe）——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他面对着诗的传统——他之前的所有强者诗人——这一咄咄逼人的父亲形象，两者的关系是绝对的对立，是后者对前者的绝对的压迫。传统企图压倒和毁灭新人，阻止其树立起自己的“强者诗人”的地位。而新人则试图用各种有意和无意的对前人诗作的“误读”，达到贬低和否定传统价值的目的。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围绕着西方启蒙运动之后的英美主要诗人。如上所述，布鲁姆把自启蒙运动迄今的整个时代都划进“浪漫主义”的范畴。其间，华兹华斯以其独特的浪漫主义诗歌取得了足以与弥尔顿分庭抗礼的地位，从弥尔顿的阴影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时代最杰出的强者诗人。与此同时，惠特曼则以美国式的浪漫主义——超验主义的手法独树一帜。布鲁姆武断地认为：在弥尔顿之前，前驱诗人对迟来者诗人的影响是健康的、慷慨的，并不使迟来者诗人感到焦虑。但是，进入浪漫主义时代以后，诗歌完全脱离了文艺复兴的轨道，染上了越来越多的个人意识（subjective），前驱诗人的影响变成某种使后人无法摆脱的焦虑。这里，布鲁姆竭力抛开历时性束缚，他进行的是一种超越历史和时间的纯文本性比较。对于这种纯文本性比较，迟来者诗人和前驱诗人的作品实际上都不是独创的或独立的“诗”，它们只是各种前人的“诗”的文本的交叉体现（intertextuality）。

为了形象地描述诗的影响与焦虑感的内在联系，布鲁姆借用了弗洛





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家庭罗曼史”模式。强者诗人之“自我”(ego)的形成是一个无意识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前驱诗人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存在于迟来者诗人的“本我”(id)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之父子相争关系。其结果是,在迟来者诗人的心理上形成了对影响的焦虑的第一情结(primal fixation of influence):由于诗歌的主题和技巧早已被千百年来的前驱诗人发掘殆尽,因而迟来者诗人要想崭露头角,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前人的某些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在“我”身上加以强化,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因为巧合而在模仿“我”。布鲁姆在本书中首创的——并以主要篇幅加以阐述的——六种“修正比”实质上就是六种削弱前人、壮大新人的技巧。在这里,“修正”一词带有“重新审视”、“否定”甚至“推翻”的含义。

布鲁姆认为,在迟来者诗人的潜意识里,前驱诗人是一种权威和“优先”(priority)——首先是历时性层面上的优先,是一个爱和竞争的复合体。以此为发轫点,迟来者诗人在步入诗歌王国的一刹那就开始忍受“第一压抑感”(primal repression)。他无可避免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受到前驱诗人的同化,他的个性遭受着缓慢的消融。为了摆脱前驱诗人的影响阴影,迟来者诗人就必须极力挣扎,竭尽全力地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争取自己的诗作在诗歌历史上的一席之地。如果没有这种敢于争取永存的“意志力”(will to divination),迟来者诗人就谈不上取得成功,就不可能成长为强者诗人。于是,在压抑感里迸发出一种进行“修正”运作的动力,使得迟来者诗人能够顶住前驱和传统的强大影响,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胜利。18世纪以来的大诗人——强者诗人——都生活在弥尔顿的阴影下,而当代的英美诗人则生活在这些与弥尔顿进行殊死搏斗后站稳了脚跟的诗坛巨擘的阴影里。这些诗坛巨擘包括英国的布莱克、华兹华斯、济慈,美国的爱默生、惠特曼和史蒂文斯。当代诗人当然是“迟来者诗人”,他们必须敢于跟上上述诗坛巨擘——新一代强者诗人——做殊死的抗争,对其进行“修正”,才有可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布鲁姆为他们设计了六种“修正”的手法,即六种

“修正比”：

1. “克里纳门”（Clinamen），意为诗的误读或者有意误读；
2. “苔瑟拉”（Tessera），意为“续完和对偶”，即有针对性地对前驱诗的续完；
3. “克诺西斯”（Kenosis），意为“重复和不连续”，即打碎与前驱的连续运动；
4. “魔鬼化”（Daemonization）或“逆崇高”（The Counter Sublime），意为朝着个性化方向的“逆崇高”运动，是对前驱之“崇高”的反动；
5. “阿斯克西斯”（Askesis），旨在达到孤独之自我净化；
6. “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意为“死者的回归”，到了最后一个“修正”境界，迟来者诗人的成就似乎可以使前驱诗人退居次席。

在写作风格层面审视布鲁姆的文学批评著作，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作者本人对影响的焦虑。为了与前人的文学理论（以及当代其他文论家的多元理论体系）一争高低，布鲁姆十年磨剑，铸就“诗的误读”四部曲，首创厚今薄古的六种“修正比”。从总体上看，他的理论体系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富有时代的挑战性，敢于否定前人。出于对“影响”的焦虑，他有意识地使用许多深奥的象征性意象，下了功夫从东西方的文化故纸堆里发掘出相当数量的意义晦涩的术语。同时，在西方学术界，布鲁姆是罕有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冒着被人指责为“剽窃”的风险，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不提供“参考书目”和“注释”的学者。在本书中，他仅仅在英文版版权页上以很小的字标出书中引用的若干诗句的出处（见本书中文增订版说明）——且只给书名，并未标明页码。到了后期作品，如《西方正典》里，则不但没有参考书目和注释，连版权页上那一点敷衍了事的交代也不再提供了。布鲁姆这样有意识地采用晦涩的文风，且在主旨甚为深奥的学术著作中不提供注解和参考书目，必然大大提高了理解的难度，使得不少研究者望而却步。至于他的这种手法有没有成功地摆脱“影响的焦虑”，答案只能见仁见智了。



此外，有必要强调一点：布鲁姆虽然自称其“误读”理论是一种“实用的辩证诗学”，但是他在本书初版时尚未跳脱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窠臼。在当时，他也许还不敢触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人莎士比亚，也许他还未准备好对莎士比亚及其原创性做深入思考，所以，在其自诩的“辩证的诗学”里，我们看到，他静止地为其适用范围画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不适用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诗歌。他当时认为，莎士比亚是英语诗歌的完美典型，莎士比亚的时代是巨人的时代，不存在能够对他产生“影响”、足以使他“焦虑”的前驱诗人。这种辩解似乎难以令人信服，也有待进一步更正或再阐释。

本书问世后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文论界对其争论激烈，褒贬不一。一本书的成功也莫过于此。上述在莎士比亚问题上的自闭做法，就布鲁姆而言，初版时仅仅是一带而过，只用了区区一小段文字。但客观上它成了本书的一个硬伤，也成了布鲁姆的一块心病。为此，当本书1997年在美国再版时，布鲁姆专门写了一篇长达37页（英文版）的前言。在这篇再版前言里，布鲁姆承认了在莎士比亚问题上的草率。他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比较详细地论述了马洛作为莎士比亚的主要前驱对莎士比亚施加的影响、莎士比亚所承受的“影响的焦虑”和他最终以压倒性的胜利彻底摆脱了马洛的影响，从而达成“诗的影响迄今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这篇再版前言可以视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看作一篇独立的论文。布鲁姆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界的泰斗人物，能够放下身架，做出一个认错检讨的姿态，确属难能可贵。令人联想起尤金·奈达在耄耋之年勇于否定自己以毕生之力树立起来的“翻译是科学”的理论。这种对学术的严谨的勇气值得国内学界借鉴。<sup>①</sup>

2005年10月于深圳大学

---

<sup>①</sup> 2019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献给威廉·K. 韦姆萨特

## 说 明<sup>①</sup>



A. R. 阿蒙斯诗歌中的引文出自他的《城市边界》一诗，见 A. R. 阿蒙斯著《简短诗集》，诺顿出版社，纽约，1971 年。

《生活在桌面上》一诗中的引文出自约翰·阿什贝利著《一些树》，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1956 年。

《片段》一诗中的引文出自约翰·阿什贝利著《片段：诗集》，黑麻雀出版社，洛杉矶，1969 年。

《最快捷修补》一诗中的引文出自约翰·阿什贝利著《双重春梦》，杜顿出版社，纽约，1970 年。

《弗洛伊德和未来》一文中的引文出自托马斯·曼恩著《三十年文集》，罗伊·波特英译，阿尔弗列德·A. 克诺泼夫出版社，纽约，1968 年。

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引文出自霍莉·史蒂文斯编《思想终点的棕榈树》，阿尔弗列德·A. 克诺泼夫出版社，纽约，1971 年。

---

<sup>①</sup> 这是布鲁姆此书英文版权页上列的书目，交代了正文中所引诗句的出处。这也是布鲁姆作为解构主义者的一个特色，其隐含的意义是“解构掉作者的权威”（to deconstruct the author's authority）。——译注



华莱士·史蒂文斯书信中的引文出自霍莉·史蒂文斯编《华莱士·史蒂文斯书信集》，阿尔弗列德·A. 克诺泼夫出版社，纽约，1966年。

西奥多·罗斯克诗歌中的引文出自贝特莉丝·罗斯克编《西奥多·罗斯克诗集》，双日出版社，纽约州加顿市，1966年。

# 再版前言：玷污的苦恼

哈罗德·布鲁姆



—

《影响的焦虑》之初稿大部分于 1967 年写出，嗣后五年屡经修改，终于在 1973 年 1 月付梓。拙著问世二十年来，学界反应至今褒贬不一，我亦感到兴趣盎然，于是写下这篇前言。本文旨在对本人有关影响运作机制之认识进行某种澄清与增补，并非对原书做解释。目前，在大多数社会领域里——包括高雅艺术、学术科目甚至公众领域——有关影响运作机制的理论研究仍然处于空白状态。我对海德格尔一直持很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有一点他很值得我学习：他每次只思考一件事，心无旁骛，一以贯之。“影响”无止境，莎士比亚笔下的“影响”一词具有两个相异却又相关的含义。看《哈姆雷特》第一幕，“鬼魂”即将第二次登台时，学者霍瑞修回忆起莎士比亚在《恺撒大帝》里描绘过的场面：

一代豪杰朱利叶斯·恺撒遇害前不久，  
坟墓里无人居住，披着殓衾的死人  
在罗马街道上啾啾鬼语。  
星辰拖着火尾，露水带血，



大阳灾变；而那潮润的星球  
虽然影响着海神的帝国  
却因月食而病入膏肓。

（朱生豪 译文）

莎士比亚走笔至此，可能想起了两年前——1598年——的情景，那时他正在创作《亨利四世》（第二部）里福斯塔夫的最后场景。是年，英国出现一次日食、两次月食，一时思想混乱，谣言纷起，甚至流传“1600年将是世界末日”的预言。然而，莎士比亚在1600年不但未见末日审判，反而因《哈姆雷特》而一举成名。但是，霍瑞修在本质上不是丹麦人，而是古罗马人。他还在对“太阳灾变”耿耿于怀。这让我们想起星相学上有关星运乖蹇之影响理论以及月亮（“潮润的星球”）光辉注入潮汐的学说。星球之光辉对我们命运与性格的“流入”是“影响”一词的初始意义，且在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那里得到人格化。同时，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戏剧里，“影响”一词还有第二重含义——“灵感”。在我写作《影响的焦虑》及其续篇《误读之图》时，有一首十四行诗曾经影响过我，但我在这两本著作中却有意不加引用。现在，我将此诗录于此：

再会！你如此珍贵而高不可攀，  
你肯定也知道自身的价值：  
你的身份赋予你取舍的权利；  
我对你的所有权到此全部终止。  
没有你的许可，我又怎能拥有你？  
我又怎能享受这样的财富？  
没有理由收受这美妙的赠品，  
我就只好将它回归原处。  
你曾将自己给了我，是你低估了自己，  
或者是我，你倾心过的人，将你误解；  
既然是这样，在遭到日益严重的误释之时，  
你的厚礼就应回归娘家。



就这样，我拥有过你，美梦般  
高高在上，醒来才知一场空。

（王勇 译文）（略有修改）

在莎士比亚的这首（第 87 首）十四行诗里，“回归”与“误释”均有赖于“误解”——应理解为一种反讽式的过度尊敬或过高估计。莎士比亚是否正以某种程度的文人式的克制在叹息失去南安普敦伯爵这样一位情人——抑或庇护人、友人？这个问题（幸亏）是无法给出确定答案的。这是一首情真意切、爱意跃然纸上的情诗，但是，从另一视角解读——并不一定是诗人的本来视角——我们也不妨将其视作一首关于作家（或普通人）与传统（特别是一位前驱身上所体现的传统）之间关系的讽喻诗。诗中的主人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对真正的传统之本质的某种不甚明晰的灼见。对莎士比亚来说，“误释”作为“误解”的对立物，其所隐指者不仅是误会或误读；“误释”更意指某种含义双关的文字游戏，带有“不公正的限制”之意蕴，也许在莎士比亚笔下，“误释”也可解作“可鄙的低估”。但是，无论做何解读，总之莎士比亚使用了这一法律术语，而且赋予它深思熟虑的——或固执己见的——错误解读。在这首十四行诗里，“回归”的主要意义是“不愉快的自由”，而“回到原处”只是其从属意义。

在《影响的焦虑》及其姊妹篇里，我把莎士比亚排除在外，因为当时我尚未准备好对莎士比亚及其原创性做深入思考。然而，离开了四百年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莎士比亚，又如何能对“影响”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研究！我有时候甚至会这样想：可能是因为莎士比亚的友人和情人们从来都缺少相互倾听，所以我们之间也很少相互沟通。这一点也从某个侧面佐证了一条不乏讽刺意味的真理：我们基本上是由莎士比亚创造的。众所周知，人性之形成本来自影响——这种影响的覆盖范围远超过任何文学现象。在 1850 年版的《代表性人物》（*Representative Men*）一书的“莎士比亚，唯一的诗人”（Shakespeare; Or, the Poet）一文中，爱默生曾对这种影响模式做过精妙绝伦的论述：

莎士比亚超乎人群，亦超乎杰出作家之群。他的智慧无可比